

传统“中国”与现代“中国”

曾 亦

自古以来，我国素称“中国”，此与公羊家之夷夏理论有莫大关系。春秋之时，楚、吴、越相继而起，凌驾诸夏，然诸夏犹能扞御之，是以《春秋》处理夷夏关系，尚能采取怀柔之姿态，或进或退，或褒或贬，犹未失自信也。自北宋以降《春秋》学再度兴盛。不过，其学术路数殆与汉唐不同，盖折衷三传乃至舍传求经矣，至于三传对于《春秋》“其旨数千”理论的阐发，多阙略不讲，其所关注者主要在两点：尊王与攘夷。这恰恰构成了夷夏理论的两个方面：

尊王。春秋时，周王不复号令天下，故黜周而王鲁，以《春秋》当新兴一统，颇有通三统之义；宋初惩唐末五季之乱，对骄兵悍将防范尤深，其所尊者，乃时王而已，其用意则在塞乱源，非若春秋时天命无所系也。且春秋时王者尚有后治夷狄之义，而宋时则绝无也。是以太祖次第削平宇内，屯重兵于京师，尽收藩镇之权，此乃宋之尊王也。

攘夷。春秋时有中国，有诸夏，彼此因种族、礼义而相亲，以此而抗夷狄也。宋时则不然，唯有中国与夷狄，种族虽绝异，礼义则稍近焉，如金之熙宗、海陵宣宗多能慕汉化，辽诸帝亦然，且金世宗得号“小尧舜”，则中国与夷狄之间，实未有先治后治之义焉。故宋时中国与夷狄皆纯粹为一种族概念。又，春秋时楚、吴、越之霸，乃中原诸夏之主也，故《春秋》能进之，能退之，非若辽宋、金宋之长期对峙可比也。

此间说《春秋》者，如孙明复、胡安国之辈，皆严华夷之界，此盖偏取《春秋》攘夷之义也，至于《春秋》以道德进退夷夏之义，则阙而弗讲焉。是以康长素讥宋儒之说《春秋》，以来“尊己则曰神明之胄，薄人则曰禽兽之类。苗、瑶、侗、僮之民，则外视之；边鄙辽远之地，则忍而割之。呜呼！背《春秋》之义，以自隘其道孔教之不广，生民之涂炭，岂非诸儒之罪耶！若不知此义，则华夏之限终莫能破，大同之治终未由至也”。¹盖《春秋》者，王霸之学也，宋时衰弱如此，宜乎不能尽得《春秋》之古义焉。

¹ 康有为：《春秋笔削大义微言考》卷6，《康有为全集》第六，北京：人民出版社，2007年，第179页。

至清世，满洲以关外小夷入主区夏，乃以倡言满汉大同为国策，而常州学者亦颇致意焉。庄、刘、魏、康之徒，阴承泯除满汉畛域之谕旨，而览乎满汉地域、文化之趋同，遂无视满汉种族之差异，宜乎清季革命党人“谄谀满洲”之讥也。虽然，宋儒所忽视之进退夷夏义，至此乃得盛张其帜矣。此时之“中国”概念，盖指同一礼义文化范围下满汉共治之国家，而夷狄则扩大到西洋红毛诸国，尤其至清中叶以后更是如此。

不过，由于内外关系的变化，清人关于“中国”的概念有些模糊。譬如，在魏源（1794—1857）那里，“中国”一词有时指整个清朝所辖的地域，和今天的用法已经完全一样，而与之相对的夷狄则是指西洋红毛诸国，以及南洋诸国；不过，有时却只指传统的“中国”范围，即内地十八省，而不包括蒙古、西藏、青海、新疆、东北和台湾在内，这时又偏于一种文化意义上的中国。民国初年，康有为折衷《禹贡》五服之制，乃欲划中国为三服，即以长城以内之中国旧壤为甸服，设府州以尹治之；沿边要地为要服，若滇桂之边、海南岛及东三省之边、四川之边、新疆之近边、内蒙古之近边，设道治之；西藏、新疆、内外蒙古、东三省之边为荒服，以都督治之。

康熙二十八年（1698），中俄订立《尼布楚条约》，清朝提供的满文本和拉丁文本中已使用“中国”一词。其后，清朝在与列强订立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中亦使用“中国”作为国家的名称。不过，清朝在对外交往和正式条约中愿意使用“中国”一词，实际上还包含着一种传统心态，即着眼于“中国”二字的字面含义——中心、中央、天下之中的国家。同样一个名词，西方人的理解只是一个国家，即China，并无特别尊崇的意思，更没有中国人赋予的那层意思。然而，“中国”一词，清朝却理解为Central Empire（中央帝国），当成一个尊称而乐意接受。因此，清朝愿意采用“中国”为国号，却并无与列国平等相待的意味。正因如此，后来日本不欲从吾“中华”之称，而采用西语china的转译，即“支那”一词。

1912年，中华民国建立，中国作为“中华民国”的简称，成了国家的代名词。至此，中国有了其明确的地理范围，即中华民国所属的全部领土。1949年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，亦以“中国”为其简称。然而，“中国”皆不复有过去“中央之国”的内涵，不过列国之一而已，于是，有着数千年历史的中国开始

进入了国际关系的新时代。

我们发现，从传统“中国”向现代“中国”的转变中，康有为的公羊学理论起了一种关键性的作用。康有为借用公羊三世理论，宣称人类已进入到升平、太平之世，即所谓“远近大小若一”，夷夏之间的差异不再重要，即便有差异，亦不过是文化进化过程的先后不同，而《春秋》讲的种族差异的内涵完全被忽视了。康氏甚至主张，种族之间的差异完全可以通过不断的人种改造来加以泯除。

这一时期的夷夏理论宣称孔子主张的大同理论在西方找到了榜样，至于数千年来中国遵循的先王之道，不过是圣人用以治理衰乱之世的办法，因此，中国欲进入更高的人类发展阶段，即升平世，乃至太平世，应该用一套新的办法即西方道路来治理中国。这样，夷与夏的关系完全颠倒了，传统中国成了夷，而西方诸国则成了夏。中国从此不再有文化上的优越性，甚至，传统中国应该放弃旧有的文化，而向西方趋近。这样，当一种为天下取法的中国观念崩溃以后，并与近代基于国家主权的国际关系体系相结合，从而催生一种仅仅作为种族或地域的国家观念，即民族国家。

因此，不论是中华民国，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，当以“中国”这种简名而自称时，不再有相对于夷狄的文化上的优越感，而仅仅指称一个中华各民族共同生活在一起的政治、地理区域。其中如果尚有些许文化上的含义的话，也仅仅是消极的，即向西方迈进的。

然而，当中国完成向现代民族国家的转变时，东邻的日本人随着军事上的不断胜利，颇欲以古之中国自比，并且，出乎与西方列强对抗的目的，又试图建立与之相关的“诸夏”观念，“大东亚共荣”之说盖出乎此也。早在19世纪末，日人近卫笃磨（1863-1904）在与康有为的谈话中已明有此意：

今日之东亚问题绝非东亚诸国间之问题，实为世界之问题。欧洲列强皆为自身之利害在东亚相角逐。东亚为东亚人之东亚，只有东亚人才有权利解决东亚问题。美洲之门罗主义，乃不外此意也。在东亚，推行亚细亚门罗主义之任务者，实贵我两国人之责任。在今日之局势下，推行此事者绝非易事。虽然如此，但我等最终之目的，非完成此一任务不可。¹

¹ 康有为：《与近卫笃磨的谈话》，《康有为全集》第四，第41页。

可见，在20世纪早期，不仅当时的日本人，而且包括部分中国人，尚有此绝大抱负，即欲举东亚之力以对抗西方异种。

1898年6月，近卫笃磨组织了同文会，其用意即在强调中日两国同文同种，相互联结。近卫笃磨甚至在当时日本影响最大的《太阳》杂志上发表了《同人种同盟，附支那问题研究的必要》一文，宣扬种族战争：

我认为，东亚将不可避免地成为未来人种竞争的舞台。外交策略虽然可能“一时变态”，但仅是“一时变态”。我们注定有一场白种人与黄种人之间的竞争，在这场竞争中，支那人和日本人都将被白人视为盟敌。有关未来的一切计划，都必须把一难点铭记心中。¹

1899年2月14日，伊藤博文在向海外教育会会议中发表演说，宣称：“我相信，尽我国力的最大限度，向（朝鲜和支那）提供帮助，不但对保全我国自身利益，而且对整个远东大势，都是正确的、必要的。”²

正是在此意义上，南海甚至直接称中国与日本为诸夏：

日本与支那，对宅于大地渤海之中，同种族，同文字，同风俗，同政教，所谓诸夏之国，兄弟之邦，鲁卫之亲，韩魏之势，而虞虢之依唇齿也。³

南海甚至有“合邦”之说：

若夫东海对居，风教相同，种族为一，则敝邑之与贵国，名虽两国，实为孪生之子。唇齿之切，兄弟一家，存则俱存，将来且为合邦。亡则俱亡，将来同夷于黑人。⁴

康氏视中国与日本为兄弟之国，其意则在对付异种之西方夷狄也。康氏此时又在

¹ 马里乌斯·詹森：《近卫笃磨》，载江晃编：《在政治及文化交流中的中日文著》，第113-114页。

² 转引自任达：《新政革命与日本》，南京：江苏人民出版社，2006年，第37页。

³ 康有为：《唇齿忧》，1899年10月底，《康有为全集》第五，第141页。

⁴ 康有为：《致大隈伯书》，1900年1月底，《康有为全集》第五，164页。更早些时候，孙中山犹视日本为兄弟之国，且以维持东亚和平乃两国之义务。（孙中山：《在日本东亚同文会欢迎会的演说》，1913年2月15日，《孙中山全集》卷三，北京：中华书局，2006年，第13、14页）就此点而言，康氏与孙氏有着共同的想法。

种族的意义恢复了夷夏理论的另一层内涵。

孙中山在一、二十年代甚至有支持日本建立东亚霸权的主张。民国初年，孙中山曾与日本首相桂太郎密谈，据戴季陶《日本论》载桂太郎谈话要点，其中有云：

我得以利用英俄的冲突和英国联盟，居然侥幸把俄国打败了。俄国这一个敌人，不是东方最大的敌人，而是最急的敌人。打败了俄国，急是救了，以后的东方便会变成英国的独霸。英国的海军力，绝非日本之所能敌，而英国的经济力，绝非日本之所能望其项背。……此后日本唯一之生路，东方民族唯一之生路，唯有极力遮断英俄的联结，而且尽力联德，以日德同盟继日英同盟之后，以对英作战继对俄作战之后，必须打倒英国的霸权，而后东方乃得安枕，而后日本乃有生命。此生命问题，非独日本，从鞑靼海峡到太平洋，全部东方民族的运命，皆以此计划的成败而决。……此两战者（指中日、日俄之战），日本不过以人民死生拼国家存亡，岂足以言侵略。若中国不强，而甘受欧洲的侵略，且将陷日本于危亡，是可恨耳。……中国有一孙先生，今后可以无忧。今后惟望我两人互相信托以达此目的，造成中日土德奥之同盟，以解决印度问题。印度问题一解决，则全世界有色人种皆得苏生。日本得成此功绩，绝不愁此后无移民贸易地，绝不作侵略中国的拙策。对大陆得绝对的保障而以全力发展于美澳，才是日本民族生存发展的正路。大陆的发展，是中国的责任。中日两国联好，可保东半球的和平，中日土德奥联好，可保世界的和平，此惟在吾两人今后的势力如何耳。……现今世界中，足以抗英帝国而倒之者，只有我与先生与德皇三人而已¹

可见，日本的扩张意识与本民族存亡的忧惧意识是结合在一起的，与西方帝国主义之扩张不同。而且，日本对抗西方列强的意识，自幕末时期就有了，其以后历次对外战争，亦是出乎此目的。出乎此种目的，乃至联合中国、土耳其包括德、奥这类后发的国家。是以其在二战期间打着“解放”之帜出兵东南亚，非其虚语，乃其民族近百年之忧患意识所致。惜乎后来之日本背弃桂太郎的道路其后，孙中山《致犬养毅书》（1923年11月16日）云：

¹ 戴季陶：《日本论》，北京：光明日报出版社，2011年，第95-98页。

贵国对支行动，向亦以列强之马首是瞻，致失中国及亚洲各民族之望，甚为失策也。今次先生入阁，想必能将追随列强之政策打消，而另树一帜，以慰亚洲各民族喁喁之望。若能如此，则日本不忧无拓殖之地，以纳其增加之人口；吾知南洋群岛及南亚各邦，必当欢迎日本为其救主也。……倘日本以扶亚洲为志，而舍去步武欧洲帝国主义之后尘，则亚洲民族无不景仰推崇也。¹

孙氏呼吁日本支持中国之革命，认为中、日利害相同，中国一旦革命成功，将与日本一道对抗欧美列强。²孙氏盖欲引日本为诸夏而共抗西夷，然日本之志，首先则在诸夏内争“中国”地位，且以自身土地、人民狭小之故，故欲先吞并东亚诸国以强大其“中国”地位。孙氏似颇为之惜，以为其目光短浅，乃失东亚人民之心。孙氏晚年甚至主张中国、日本联合起来，组成一个联邦，甚至可以包括安南、缅甸、印度、波斯、阿富汗在联邦之内，以对抗欧洲。³

日本战败以后，毛泽东屡屡强调中日两国人民团结起来对抗美帝国主义，盖视日本为诸夏也。⁴日本欺凌中国如此，而中国犹能以诸夏而恕之，遑论素来为中国藩属的南洋诸国，更当以诸夏相待矣。

¹ 《孙中山全集》卷八，第401、402页。孙氏又称许中国之免于欧美列强瓜分，赖于日本之崛起也，“列强中初有欲并吞之者，而阻于他强，遂有议而瓜分之者，不期适有日本崛起于亚东之海隅，而瓜分之谋又不遂。当此之时，支那之四万万人与亚洲各民族，无不视日本为亚洲之救主矣”。（同上，第402页）

² 参见孙中山：《致犬养毅书》，《孙中山全集》卷八，第404页。

³ 孙中山：《三民主义·民权主义》，1924年4月13日，《孙中山全集》卷九，304页。

⁴ 参见毛泽东：《美帝国主义是中日两国人民的共同敌人》、《日本人民斗争的影响是很深远的》等文，《毛泽东文集》第八，人民出版社，1993年。